在『通』和『统』上下功夫

■ 董幼鸿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是上海在智慧城市与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的亮点。下一步,“两张网”建设应该在“通”和“统”上下更大功夫,更好发挥整体合力,确保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这既是人民城市、智慧城市的必然要求,也是由“两张网”的基本属性决定的。

第一,“两张网”建设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要求和价值取向。

“一网通办”建设的目的是“高效办成一件事”,主要是简化民众办事的程序和流程,让数据多跑路、民众少跑腿。

“一网统管”建设的目的是“高效处置一件事”,主要是基于民众急难愁盼的难点、痛点问题的高效解决,优化居住环境和营商环境,满足市民衣食住行和生产生活的高质量需求。

第二,“两张网”建设都是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与服务流程的再造。

“一网通办”是借助技术手段的赋能,优化政府管理的体制机制,打破部门信息和资源分割障碍,简化办事流程、手续和材料,提高政务服务效率。

“一网统管”是借助技术手段,强化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和大数据中心的赋能,重在打通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和资源壁垒,进一步整合人力、物力和财力,解决单一部门或主体难以解决的事务。

第三,“两张网”建设都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实现技术治理嵌入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过程,提高城市技术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一网通办”的技术路径是通过现代化技术手段打通各职能部门信息、资源的障碍和屏障,实现办事资源和数据共享。

“一网统管”建设的技术路径是通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和大数据中心的平台建设,实现各大业务系统的优化组合,快速高效处置跨部门、跨层级和跨业务的事务。

第四,“两张网”运行机理相通,都以解决具体的“应用场景”为路径依赖。

“一网通办”通过解决体现民众办事需求的“应用场景”任务,来实现为民服务的目标。

“一网统管”体系运行是通过解决基于城市运行中的难点、痛点问题的“应用场景”任务来实现有效治理,强调处置事件的协同性和联动性。

第五,“两张网”建设和运行对从事政务服务和城市运行的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网通办”要求公务人员根据政务服务的流程和标准,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这对公务人员的新技术运用熟练程度和服务理念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网统管”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及时研判城市运行的生命体征,强调精细化、智能化治理。这对干部队伍的智能化素养与管理流程再造提出了更高要求。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应急管理培训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走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困境

■ 高立伟 毛恩强

当前,全球疫情还未得到有效遏制,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开始出现“第二波疫情”。这表明全球卫生防疫面临多重困难,治理困境凸显。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具体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切实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走向深度合作?

> 医学科技是全球公共卫生防疫与治理的基石。在新发疾病频繁暴发流行的时代,医学科技是最需要无私奉献精神,最需要紧密合作、深化交流的领域。要切实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医学科技由“封锁独享”向“协同攻关”加速转换

“治理赤字”加剧

导致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念共识不一致是根本原因。“强权至上、零和博弈、经济理性、单边主义”是西方大国的固有思维。在深度全球化的趋势下,这种思维理念和价值追求缺乏包容性、民主性和代表性。这是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失灵的前提性根源,必须“重塑转型”。

第二,部分行动主体的责任意识弱化。主权政府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关键行为体,但一些国家奉行本国优先政策,担当意识越来越弱化和缺失,甚至无底线地推卸责任。与此同时,一些非政府民间组织,包括大型跨国企业、基金会机构和个人等,又难以肩负起更大的责任,促使“治理赤字”进一步加剧。

第三,现行机制模式难以发挥高效治理功能。一方面,少数掌握话语权的主权国家不合作的意愿与行动日趋严重,甚至直接甩锅、拆台,使得诸如世界卫生组织这样具有代表性、权威性和专业性的国际组织受到挑战。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也使得现有治理机制的局限性有所凸显。

第四,卫生信息与技术共享还存在障碍。在全球卫生防疫与治理行动中,信息与技术共享是核心和关键。但是,当前全球卫生治理信息互联互通系统还不够完善,国际社会疾病监测预警、防控进展追踪、技术联防联治等体系还存在结构性缺陷。同时,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比较滞后、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技术人员缺乏等因素,客观上存在“有心无力”的情况。

种种因素和情况使得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凝聚共识、精诚合作,基于更加包容、公平和可持续的理念,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协力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走向深度合作与改革完善。

治理理念须变革

在治理理念上,要由“零和博弈”向“命运与共”深度变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过程中,一些国家依然秉持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陈旧理念,逆世界潮流而动。这种理念亟须摒弃和改变。

面对疫情在全球蔓延的严峻挑战,谁也无法独善其身、置身其外。任何国家都不能从别国的困难中谋取利益,从他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如果以邻为壑、隔岸观火,别国的威胁迟早会变成自己的挑战。

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战而胜之。各国应凝聚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增进全人类共同利益为价值旨向,将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摒弃歧视、偏见和污名化,克服单边和本土主义,精诚团结、行动一致,为全球疫情防控的最后胜利奠定共同的理念和价值基础。

优化整合治理主体

在行动主体上,要由“无序散落”向“协调聚合”积极转换。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行动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如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教科文组织等在卫生治理方面都积极行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也日益关注全球公共健康发展。

一方面,随着行动者的多元化,每个行动主体既可能是资金提供者、计划发起者,又可能是计划的实施者,甚至是监督者和评估者。在治理结构、系统、边界日益模糊的情况下,需要协调的事务更趋复杂广泛,需要面对的问题更加多样多变,难度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基于“零和博弈”理念,少数极具影响力的国家行动主体大搞“去中心化”,故意削弱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国际卫生防疫引领者与治理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为此,有必要在优化整合行动主体治理边界、功能、结构的基础上,既倡导多边多元行动主体参与国际卫生防疫与治理,又坚持维护和明确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心地位。

推进治理机制转型

在机制模式上,要打造互嵌融合、系统高效的结构框架,推进治理机制模式由“脱钩解构”向“深度互动”切实转型。

近年来,逆全球化等思潮无可避免地冲击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运行机制和实践模式。下一步,要将疫情防控纳入全球“最高安全议题”,尽快建立全球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建立全球和地区防疫物资储备中心;要进一步优化治理结构,强化会员国集体行动的法律义务,完善卫生治理机制立法缺陷,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

着眼于未来,应努力推动治理模式从救灾救治转向预防备灾,从被动应战转向主动防控,从应急处置转向全过程风险管控。唯有如此,才能构建可持续性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新机制、新格局。

协同攻关加速发展

在医学科技合作上,要秉持开放共享、创新提升的原则,推进“封锁独享”向“协同攻关”的加速转换。

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医学科技关乎每个国家的卫生健康保障,更关乎全人类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医学科技是全球公共卫生防疫与治理的基石,是国际卫生合作的核心内容之一。可以说,没有医学科技的合作,就没有国际公共卫生治理事业的发展。

在新发疾病频繁暴发流行的时代,在人类命运比任何时候都紧密相连的今天,医学科技是最需要无私奉献精神,最需要紧密合作、深化交流的领域。各国要以造福人类生命健康为目的,切实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医学科技由“封锁独享”向“协同攻关”加速转换。

其中,尤其要关心和照顾发展中国家,鼓励医学科研水平先进、医疗科技体系强大的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积极提供支援。

资金渠道需“开源”

在资金筹集上,要探寻广开门路、多方开源的策略方法,推进全球卫生治理资金援助由“来源有限”向“渠道多样”的尽快转变。

目前,世界公共卫生的防疫与治理资金主要依托世界卫生组织筹集运转,经费来源主要包括会员国强制捐款和国际社会自愿捐助两大块。但由于种种原因,相关运转资金越来越捉襟见肘,资金筹集也日趋困难。为此,需要广开门路、多方开源。

一方面,建立相关激励机制,鼓励更多主权国家及相关集团自愿捐助,更加重视发挥基金会、大型跨国企业、行业商会、私人部门、产业后援性非营利组织等各类非政府组织以及具有影响力的个人、群体的作用。

另一方面,完善全球卫生法律制度,明确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和捐资主体资格等,推动多元行为体联合提供卫生公共产品和财政资金,推进资金筹集模式由“来源固定有限”向“渠道多元多样”转变。

(作者分别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急诊科主任、上海市新冠肺炎救治高级专家组成员)

在科创中心航道上勇开善开“顶风船”

■ 于新东 牛少凤

“十三五”时期,上海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航道上乘风破浪、蓄势远航,构筑了科创中心“四梁八柱”,形成了科创中心基本框架,进一步显现以下几大亮点:

一是锚定创新策源。

策者,谋也、动也;源者,根也、本也。策源具有鲜明的源头性、发动性、标志性、成长性、颠覆性、引领性等特征。

5年来,上海以全球为视野,以源头攻坚为发力点,以填补空白、合作共赢为方略,以推陈出新、兼收并蓄为路径,以促进发展、造福人类为最终使命,为推进科技创新提供源头性、开创性贡献。

比如,张江国家实验室建设稳步推进,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大科学设施群初步形成,为全球科学家展开生命科学、物理、化学、材料、环境、地质、生物医药、微电子等诸多学科和产业的攻坚与前沿实验提供服务。

二是支撑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变量。5年来,上海科技创新坚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积极赋能产业、民生、城市、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领域,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作出了新的更大贡献。

比如,持续加大生命健康、海洋科技、再生能源、燃料电池汽车、现代农业及食品安全、区域环境质量改善以及城市建设管理、公共交通与安全等民生科技领域的布局和成果推广,累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800余项。

三是加强基础研究。

5年来,上海的基础科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整体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

比如,着力培育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推动光子与微纳电子、生物医药和脑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家实验室筹建工作,启动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量子科学中心等数十家代表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发展方向的研究机构建设。

2019年,上海科研人员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自然》《细胞》上发表的论文数占到全国的近三成;在国家科学技术奖方面,连续4年获奖比例超过15%。

四是持续深化改革。

5年来,围绕科创中心建设这个总任务,上海密集打出强化制度创新与政策供给的系列组合拳,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科技政策法规制定,构建起覆盖门类齐全、工具举措多样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法规陆续出台。

其中,科创中心“22条”、科改“25条”、《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以及《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等带有鲜明特色的改革创新成果,有力保障科创中心建设,有力推进科技治理朝着法治化、规范化、便利化前行。

五是拓展国际合作。

5年来,上海勇开、善开“顶风船”,同更多国家和地区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加大科技创新的交流合作。2019年,新增6家“一带一路”国际联合实验室,实施60项青年科学家交流项目。目前,累计集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15家,外资研发中心465家,均位居全国第一。

同时,浦江创新论坛和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国际会议平台,推动全球科技创新的交流碰撞。

明年将开启“十四五”新征程,上海将进一步深耕细作、勇攀高峰,加大原始创新,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努力开创科技创新与人民城市建设良性互动发展的新格局。

(作者单位: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助力金融中心建设达至“形神兼备”

■ 本报记者 夏斌

2020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十四五”开局在即,怎样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如何以金融文化助力金融发展?上海金融文化促进中心理事长、上海爱建集团党委书记范永进,上海金融文化促进中心常务副理事长、资深出版人沈惠民作出了自己的思考。

开发开放的“点睛之笔”

记者: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回顾历史,当时为何会喊出“金融先行”的口号?

范永进:“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东西联动”,是当年浦东开发开放的一个重大战略。

浦东开发开放具有建设规模大、产业层次高、资金需求多以及筹资时间急等特点。在短时间内筹集到足够的建设资金,是浦东开发开放顺利起步的关键。今年还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30周年,上交所的筹建就与解决开发建设资金不足有着密切关系。

那时,我在由朱镕基市长亲自兼任主任的市外资委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接浦东,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如何利用金融渠道扩大引进外资等。

针对浦东“金融先行”的做法,小平同志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由此,注重发挥金融的创新引领作用,可以说是浦东开发开放的“点睛之笔”,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更好服务全国发展、更好链接国际市场的题中应有之义。

记者: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号角,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走过了怎样一段发展历程?

范永进:金融中心是市场、机构、人才、服务的集散地,需要具备和发挥产品定价、资金结算、风险管理、市场信息、金融创新等功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是在跨越一个个重要节点的过程中不断进化、成熟的。

第一个节点是1990年,上海正式确立“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发展目标,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基础建设阶段。

第二个节点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针对经济全球化和世界金融竞争的发展趋势,从现代化发展全局高度制定的国家战略。

第三个节点是进入新世纪,明确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三步走”战略:五年打基础,十年建框架,二十年基本完成。当时,我调往刚成立的市金融办任职,有幸直接见证和参与了这一历史进展。

第四个节点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务院适时提出:到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建设历程,一个深切感触是:它不仅提高了上海乃至全国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而且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

记者: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金融文化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范永进:文化是金融之魂。记得当初在讨论金融中心建设的时候,有同志担心:如果有失误,金融中心就会变成一个风险中心。实际上,金融风险有很多种,道德风险是其中的一种。而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一旦蔚然成风,就能在制度管不到的地方有效发挥“管人”的作用。

往大的方面看,金融文化对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完善金融服务、保障金融安全、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与合作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沈惠民:有感于金融文化的时代价值,上海金融文化促进中心多年来坚持“分享人生、回报社会,留下足迹、记录历史,培育新人、传承事业”的理念,致力于抢救相关史料、传播金融文化等,着力讲好上海乃至中国的金融故事。

比如,2009年编写出版的《见证中国股市》,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记录、反映中国证券市场的变迁与发展进程;出版“金融文化丛书”,关注资本市场发展、企业制度演变、民营经济及企业家精神等课题;与市委党史研究室合作,对证券市场早年亲历者做好口述历史工作,相关著作将在年内出版。

“金融+文化”的化学集成

记者:在已有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如何进一步提升能级?

范永进: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非常关心。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事关全局的国家战略,是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抓手。下一步,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既要积极借鉴纽约、伦敦的先进经验,也应充分发挥我们自身的特点与优势。

一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如不断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注册制改革是一项基础性改革,可以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主要体现在对全球资源的配置上,如是否有境外企业来上市、境外投资人能够多大程度和多大便利地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等。

此外,如何更积极地运用金融科技如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特别是提高服务能级与效率,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沈惠民:金融业是一个“直接与钱财打交道”的行业,容易受到各种诱惑。在推进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中,尤其需要文化的滋养和熏陶,需要精神领悟与思想品位,需要融合与创新。

我们多次举办过相关论坛,研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文化。达成的一个共识是:金融文化不是简单的“金融+文化”,而是金融元素和文化元素的化学集成、基因组合,是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在气质与外在形象的有机融合。

新时代的金融文化建设,需要更多地关注社会需要,引领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发展。同时,要注重引导、激励以及监督、约束,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由“形似”达至“神似”,乃至“形神兼备”。

记者:中国拥有源远流长的金融文化传统,从中可以得到怎样的启发?

沈惠民:相对于资金、技术、法规等“金融物”,金融文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更多的是“金融人”。比如,面对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投资理财的情况,可以开展更多的金融知识普及与文化讲座,加强诚信建设。

在这方面,中国自先秦时期以来积淀了丰富的传统,如推崇诚信义利、强调严格审慎、奉行以人为本等,都值得认真总结与推广。

比如,很多古代钱庄的商号名称是义、信、诚、益、仁、和、协、德等字的排列组合,可见商家历来都致力于营造诚信义利的商业氛围。

范永进:基于传承优良传统与发展现代金融文化,新时代有必要进一步倡导信用与效益并重、德治与法治并重、合作与竞争并重、稳健与创新并重的金融文化。

一个重点是注重合规文化建设。

防范和控制风险是金融业的永恒主题。依法经营、合规操作,不仅是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对员工最大的保护。

另一个重点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要不断提升对金融文化本质的认识和把握,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更多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确保“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双轮驱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此外,要注重发挥海派文化的引领作用。上海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经济中心。有人总结说,浙商精神是“守志笃行、诚信为怀、开天掘地、有容乃大”,苏商精神是“厚德、崇文、实业、创新”,而沪商精神最鲜明的特质是“敢为人先”,这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中、在金融文化的构建完善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走到今天,走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海派特点的道路。对此,我们不仅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同样要具备文化自信。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文化的凝练、传播、弘扬,不仅在于强健国际金融中心之体魄,更重要的是以文化滋养其灵魂。

牵引国内旅游提质升级

■ 冯学钢 郝晨

以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为契机,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强劲复苏。其中,山水名胜、文化游、主题乐园游成为热门选择,夜间旅游、红色旅游成为新亮点。

“私密小团”、精品线路的火爆表明,旅游复苏不是回到疫情之前,而是适应新需求的提质升级。在上海,郊区游热度攀升带动市民“访古”。广富林文化遗址嘉年华、上海大观园古风巡园、朱家角夜游盛宴、练塘古镇茭白节、庄行干塘节等特色活动融民俗与时尚于一体,令人耳目一新。

“预约旅游”成为主流。全国各大景区按照“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对门票预约管理制度进行完善,以此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数据显示,线上预订排名前五的人气景区分别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武汉黄鹤楼、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上海野生动物园以及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

需要注意的是,出境游客的回流,在加速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国内旅游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游客的品质化需求和多元、多层次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尤其是个性化的旅游需求。这就需要旅游企业在提升服务质量、专业化程度以及发展多元化、多层次旅游产品方面下功夫。

在提振旅游景气的同时,一定要把交通安全、景区安全以及疫情防控安全放在首位。坦率地讲,一些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现象依然存在,工作缺乏针对性、精准性。新形势下,不仅要增强景区从业人员与旅游者安全意识、加强景区与相关政府部门协作、强化旅游安全保护设施建设与管理,还要建立健全景区安全管理预警系统、景区安全应急救援体系。

同时,防疫安全不可懈怠。要做好游客体温测量、健康码审核、戴口罩提示、运输车辆消毒等,把安全工作和疫情防控措施制定得更严密一些,把制度落实得更细致一些,既让游客玩得安全舒心,也确保疫情防控扎实有效,用安全、舒适、放心的旅游环境吸引更多游客回归国内旅游。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